

巴勒斯坦文学生长于废墟与炮火，却从不匍匐哀戚。在被封锁的土地上，文字为逝去的生命守往最后的故里，也为活着的人亮起不熄灭的光。

《如果我必须死去》正是这样一部来自加沙的作品集。巴勒斯坦已故诗人和学者里法特·阿里尔用诗歌和散文记录故土，时间跨度达13年的文字，让读者走进一个由无数具体的人、炽热的情感和向死而生的生命经验构成的真实世界，看到加沙人民始终以尊严、希望和爱回应苦难。

他的生命是一次壮烈的书写

生于1979年的阿里尔是土生土长的加沙人，他曾在加沙伊斯兰大学担任英语文学教授。他选择教授并使用英文写作，是为了让世人了解加沙正经历的一切。他坚信，巴勒斯坦人必须拥有自己的叙事，“如果不讲，那就是自私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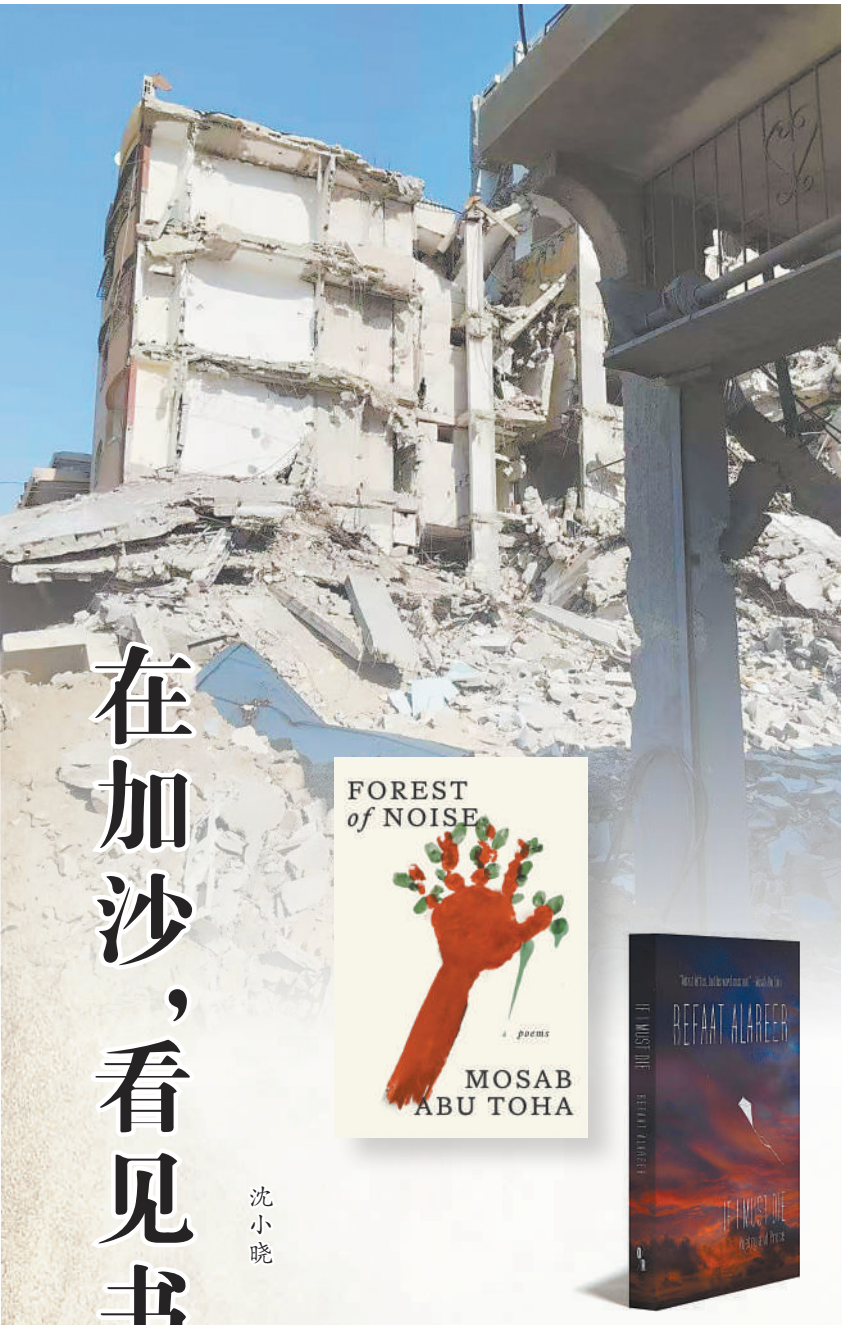
2014年，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发起代号为“护刃行动”的大规模军事攻势，长达50天的流血冲突造成20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、逾万人受伤。阿里尔的家被以色列的轰炸摧毁，年仅31岁的弟弟穆罕默德不幸遇难。在怀念文章中，阿里尔回忆这个腼腆却风趣幽默的弟弟如何成长，并出演加沙最受欢迎的儿童电视节目。为了妻子和一双儿女，穆罕默德倾力建起属于自己的公寓，却因封锁迟迟无法购置家具。战争夺走了一个儿子、一个兄弟、一个丈夫、一个父亲的生命，夺走了无数个未能讲完的故事。

“要不要拥抱孩子？”“能不能让孩子吃第二块饼干？”“全家人是睡在同一个房间，还是分开睡？”对阿里尔来说，这些生活日常却都成了抉择：每一次拥抱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次，第二块饼干可能是最后一口食物……阿里尔提出的这些问题，读来惊心动魄，又沉重如山。

在阿里尔看来，以阅读和写作来抵抗战争对文明的摧毁，是最好的反击。他带领学生读莎士比亚、狄更斯，引导学生阅读与对话中突破偏见、理解人性，涵养坚定意志和高尚人格。他创立社团，鼓励年轻人勇敢执笔。

《如果我必须死去》是阿里尔2011年献给女儿希玛的诗作：“如果我必须死去/你必须活下去/讲述我的故事/卖掉我的遗物/买一块布/和一些线/(做成白色的长尾风筝)/这样，加沙某个地方的孩子/仰望苍穹/等待着在烈火中离去的父亲——/那个没有向任何人告别的父亲/甚至没有向至亲告别/甚至没有向自己告别——/他看到风筝，你为我做的风筝，在空中翱翔/那一刻，他会以为是一位天使/带来了爱/如果我必须死去/让它带来希望/让它成为一个故事。”

2023年12月6日，阿里尔遭以色列空袭身亡。此前他曾收到无数死亡威胁，最后一通匿名电话甚至明确指出了他的位置。他被迫离开，但炸弹还是找到了他。他去世后，《如果我必须死去》被翻译成40余种语言，人们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纪念他：朗诵、歌唱、放起白色长



沈小晓

尾风筝……2024年，同名作品集出版。但格外残酷的是，阿里尔在诗中对话的女儿，也在几个月后与她仅两个月的孩子一同死于空袭。

阿里尔毕生致力于教育和写作。他曾说，写作是一种见证，是一段超越任何人类经验的记忆，也是一份与自我、与世界对话的责任，“我们活着是为了讲述关于失去、生存和希望的故事。”而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次壮烈的书写。

“我写作，故我存在”

书写即抵抗。1948年5月14日，以色列宣布建国。次日，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，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。失去家园的人们流散四方，其中大量涌入加沙，并长困于此。“我写作，故我存在”，一代代巴勒斯坦作家以笔为武器，无畏地记录着占领者犯下的种种暴行，并在废墟上重建精神家园。

巴勒斯坦作家格桑·卡纳法尼首次系统提出“抵抗文学”的概念，将其定义为反抗压迫和占领、呼吁自由和独立的文学。在持续的战乱中，作家们也发展出独特的表达风格，战争期间，她还开了一家网上书店，“我热爱收藏书籍，也希望在危急时刻帮助更多人读到书”。

故事围绕巴勒斯坦老人阿布·阿里从外国士兵手中夺枪的故事展开。被占领当局禁止的枪(即标题“禁忌武器”)代表巴勒斯坦人武装抵抗的权利，主角阿里象征巴勒斯坦民众中沉默但渴望行动的力量，村庄和房屋则是巴勒斯坦人失落家园的缩影……作家精心编织了一系列象征符号。故事结尾，老人生死不明，妻子坚守屋中，开放性的结局暗示了抗争仍存希望。

长期的战争与流散，使“我是谁”成为巴勒斯坦当代文学反复追问的问题。对故土、人民和历史的书写，守护着民族共同的记忆。巴勒斯坦民族诗人马哈茂德·达尔维什是其中最重要的声音之一，“身份”是其诗作的核心命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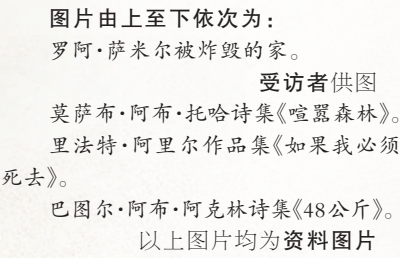
当达尔维什在《身份证》中反复吟唱“记下来，我是阿拉伯人”时，他将一句诗化为一声呐喊：你可以不断盘问我，登记我的姓名、编号、子女数目，但你无法剥夺我作为一个阿拉伯人而存在的权利。这首诗也成为巴勒斯坦民族精神与身份意识的重要符号，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巴勒斯坦抵抗文学创作。

2023年10月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。两年多以来，大量作家、学者、教师、艺术家遇难。但一首诗的消逝，会催生出另一首诗的生长。生于1992年的莫萨布·阿布·托哈曾是阿里尔的学生和挚友，他写下：“别吃惊，当你看见/一朵玫瑰在家宅的废墟中/昂首挺立/这就是我们活下来的方式。”2025年，他的诗集《玫瑰朝上》被译为中文，中国读者可以从诗中聆听加沙的心跳。

巴图尔·阿布·阿克林今年21岁，也已出版她的首部阿英双语诗集《48公斤》。诗集由48首诗组成，每首诗都代表她的一公斤体重。“我把诗歌视为我血肉的一部分，所以我收集了我的身体——以防我被炸碎，没有人埋葬我。”

加沙女孩罗阿·萨米尔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诗。她的家遭到轰炸，亲人们在战火中丧生。即使流离失所，她也没有放弃阅读和写作。“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、莎士比亚的作品，还有柯南·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。”她告诉，阅读是她的避风港，战争期间，她还开了一家网上书店，“我热爱收藏书籍，也希望在危急时刻帮助更多人读到书”。

阅读来自加沙的文字，很难保持全然的理性。那些文字像从硝烟里逃出的火种，带着灼人的热度，在记忆里毕剥作响。在报道加沙局势时，我总想起那首《如果我必须死去》。“向死而生”，这正是巴勒斯坦文学的一大特质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作者们依然在文字里种下希望，等待后来人在废墟中将其拾起。当诗人写下自己的故事，他们也在对读者嘱托：或许我们无法阻止炮火，但至少可以选择不忽视、不沉默，让硝烟下的故事继续被讲述、被聆听。



寻访那不勒斯地下城

夏宇轩

进入剧场遗址，空间豁然开朗。公元5至6世纪时，剧场在洪水中损毁。1000多年后，人们已经忘记它的存在，然而城市房屋的排布方位和街道穿行的走向，仍旧依稀可见剧场昔日的轮廓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数万那不勒斯居民再次走入地下城，地下水道变为市民暂时栖身的防空洞。1943年9月，那不勒斯居民自发起义，反抗德国占领军。起义者利用地下水道发起突袭，最终赢得胜利。如今，人们在此还能看到墙上的祈祷文字、战时遗留的武器，找到床铺、卫生设施、旧照片和孩童玩具。在这里，关于战争、生命和希望的记忆持续流传。

走过历史沧桑，那不勒斯地下城正焕发新的生机。2015年，那不勒斯地下城协会启动“地下花园”项目。水道中湿度很高，又能躲避现代工业污染，生菜、罗勒等寻常蔬菜在人造光源的照射下茁壮成长。如今走入幽暗潮湿的洞道角落，在转角遇到一片片生机勃勃的地下“绿洲”，令人眼前一亮。

走出地下城，阳光将我带回今天的那那不勒斯。富有生活气息的街道狭窄曲折，往来穿梭的行人享受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美景。我不禁想到，地下城曾被历史掩埋，被人们遗忘，却始终如大地深处的根系，为城市的每寸生长输送深沉的养分。

本版责编：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
电子信箱：rmrbgfk@peopledaily.cn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阅见世界

20世纪汉学史上，荷兰人高罗佩（本名罗伯特·汉斯·范·古利克，1910—1967）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。他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传统与西方侦探小说结合，创作出享誉全球的《大唐狄公案》系列小说。他以中国古代士大夫自况，与中国文化界人士交游唱和、琴书互赏、惺惺相惜，通过深度生活实践叩开中国文化之门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年3月出版的《漫逐浮云到此乡：高罗佩传》（见右图，资料图片）中，就讲述了这位荷兰外交官、汉学家、小说家一生跨越国界的文化行旅。

高罗佩出生于荷兰，幼年时随家人前往巴达维亚（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）生活，在当地中国城种下热爱中国文化的根芽。他中学时开始学习汉语，在大学期间广泛学习其他亚洲语言，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荷兰外交部，足迹包括东京、开罗、重庆、新德里、贝鲁特、吉隆坡等。无论在何处任职，高罗佩都对中国文化心有所系，他醉心中国古籍、文统，对汉学研究的专注甚至招来上司的微词。

高罗佩的汉学贡献中，最为大众称道的是他对狄仁杰这一历史人物的重塑。20世纪40年代初，清代小说《武则天四大奇案》让高罗佩与1200多年前的大唐名相狄仁杰结下不解之缘。从写于1950年的《速宫案》到临终前完成的《中权案》，高罗佩共以英文创作24种狄公案系列小说（中篇16种，短篇8种）。高罗佩的创作极大丰富了《旧唐

漫逐浮云到此乡——“荷兰士大夫”高罗佩的汉学行旅

施晔

书》中“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，无冤诉者”的狄仁杰形象，他笔下的狄公身兼神判与神探，“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，其访案之细、破案之神，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”。于狄公形象中，高罗佩既融入理想士大夫之风范，亦寄托其自家情志：琴棋书画无不精通、诗文翰墨工敏清新，既秉孔孟之仁，更有七情六欲。这位“东方福尔摩斯”深深征服了西方读者，也唤起东方读者的广泛共鸣。《大唐狄公案》至今已翻译成29种语言，并不断催生出仿作和剧本、影视改编，还进一步拓展至游戏及人工智能等跨媒介形态。

20世纪中叶，欧洲汉学界普遍热衷于语文学研究、古文献训诂，高罗佩却另辟物质文化研究之蹊径，将目光投向砚石、古琴、屏风、书画等承载着中国古代雅文化的器物。不过，他的终极目标是透过这些物质形态，去触摸中国士大夫的精神脉动。以其琴学专著《琴道》为例，高罗佩从史学、哲学、文学、美学、

社会学等领域讨论中国古琴及琴乐，由此阐发传统文人的生活哲学。

1943年，高罗佩前往重庆赴任。为了真正理解古琴，高罗佩深入参与“天风琴社”的组建和雅集活动，与查阜西、徐元白、杨少五等琴家切磋琴艺、共研琴道，不克晤时则函札往还，互通琴学思想。在高罗佩心目中，古琴不仅是一种乐器，更是士人修身养性、寄托情志的载体。这种由器物研究走向文明核心的方法，使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，在指尖与琴弦的接触中完成了与伯牙、子期的精神对话。

在渝期间，高罗佩与出身名门的中国女性水世芳结为百年之好。通过水氏家族，高罗佩得以从“客居”转向“在地”，与这个他始终心向往之的东方国家结下更深厚的情缘。在他与岳父水钧韶的往来家书中，我们看到一位老派中国家长对洋女婿的接纳与指引，看到两人在礼仪、传统与跨国联姻中的细微博弈。小家庭之外，高罗佩的交游图谱涵盖了画家徐悲鸿、傅抱石，书法家于右任、沈尹默，更有陈垣、马衡、顾颉刚、梁思成等学界巨擘。在高水准的智识碰撞中，高罗佩积淀了构建《大唐狄公案》《书画鉴赏汇编》与琴学专著丰沛底蕴。这种基于共同审美旨趣的深层互动，使高罗佩成为民国学术星空下的一位“荷兰士大夫”“精神中国人”，也令其汉学研究自带温情与厚度。

高罗佩的一生，是汉学从他者研究走向文明互鉴的缩影。作为外交官的



高罗佩生活漂泊无定，但不论所居何地，他都为自己布置中式书斋，古籍古琴相伴，习字临池，案头焚香。他为书斋取名“犹存斋”，表达在战乱中保留中国古典文明火种的愿景。他曾自慨：“你身在西方，但可以自由居住在你的东方之中。”当国内学者将高罗佩《大唐狄公案》及其诸多汉学著译译为中文时，引发了异质文明交流中著名的“文化回返”现象——中国读者惊讶地发现，一位荷兰人竟然能如此精准地勾勒出中国古典文明的风神骨相。

在新版《大唐狄公案》和《高罗佩传》面世的当下，我们纪念高罗佩，不仅因他丰硕的汉学成果和小说创作，更应着眼于他提供的跨文化交流范式：跨越语言的藩篱，穿透偏见的迷雾，在琴声、墨迹与烟火气中，找到通向人类共有文明的精神密码。高罗佩的汉学行旅虽止于1967年，但他终生探索并守望的精神原乡，仍在跨越时空地召唤着每一位亲近中国文化的后来者。

（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，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文化西传研究”阶段性成果）